

从“工程学社会主义”到“斗争型社会主义”： 读阿尔都塞《怎么办？》

姚云帆

阿尔都塞坚持实践的物质性，从而反对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并试图以马基雅维利为例，强调权力的生产性，试图从“权力争夺”的角度重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发展路线，在西方，这是一种受到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影响所产生的全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阿尔都塞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其否定和修正苏联东欧“工程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必须重新对其学说进行具体分析，让其兼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工程”面向和适当借助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现实。

一、略述阿尔都塞的写作意图

阿尔都塞的《怎么办？》(*Que Faire*)是一部具有论战性质的小著作。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这部著作和他讨论的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方法的论文有一定的差别。后者着眼于处理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诸多问题。例如，唯物主义何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一门科学或哲学？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何以成立？而《怎么办？》处理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即在当下的处境下，社会主义者应该何去何从，应该研究什么问题？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部书的标题呼应了列宁的同名著作。但是，这两部著作恰恰又在相同中凸显了一种不同。相同之处在于，阿尔都塞肯定是要回到卢卡奇所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他和列宁一样，都反对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体制和社会生产方式妥协的“修正主义”立场。在列宁那里，对立面是伯恩斯坦主义、俄国社民党人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对立面是庸俗化的葛兰西主义。但是，列宁的《怎么办？》是从实践中带出的一种理论，而阿尔都塞的《怎么办？》则是将理论看作一种实践方式，从而改变了实践的战场。这种理论上的差异只有从历史背景的差异中才能够被洞见：列宁的作品发生于资本主义在时间上的危机时刻和空间上的薄弱环节相耦合的时刻，他所做的工作是洞见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可实践的契机，从而让革命者抓住这个契机；阿尔都塞的著作发生于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接近完成的时刻（尽管是临时性的）和社会主义实践空间出现缩小的时刻，他所做的工作则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危机时，让革命者洞见了社会主义实践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这让阿尔都塞的工作包含了三个方向：（1）讨论社会主义实践的物质性，尤其是意识形态实践的物质性；（2）反驳葛兰西主义的“绝对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3）经由马基雅维利主义，重提作为实践的阶级斗争。这一工作的三个方面环环相扣，充分体现了阿尔都塞写作的严密性和论战性。阿尔都塞首先处理的问题在于，实践在何种物质条件下诞生。这一工

作隐去了其背景，所以不太好完全被读者所把握。我们试图对此做一澄清。

二、实践的物质性：阿尔都塞论“具体处境”

实际上，从 1960 年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实践是个人和集体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所进行的斗争。这个表达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却弱化了实践主体和实践行动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所以阿尔都塞引入了列宁和毛泽东都使用的一个表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①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阿尔都塞还使用了“具体处境（情况）(situation concrète)”^② 这个词语，由此将这个表达转化为“立足于具体处境进行分析”。“处境”概念在 1960 年代的法国思想界影响巨大，无论是阿尔都塞的前辈萨特，还是他的晚辈巴迪乌 (Alain Badiou)，都强调人的实践和存在必须依托一定的处境才能得以进行。但阿尔都塞对“具体处境”的理解有其独特性。他强调的是分析处境，而不是超越处境；在萨特和巴迪乌那里，对处境的超越和对处境的分析同样重要，但阿尔都塞更强调分析这一处境。这和他哲学立场中对认识和实践主体的超越性较为怀疑有关。在阿尔都塞看来，“处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人或物所依赖的物质环境；第二层含义是人或物与这一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包含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物质性，第二个特点是对抗性。人不能离开特定的物质条件去设想人与人、人与物，乃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旦进入社会关系中，人的处境并不由简单的物质条件所决定，而由物质条件所限定的社会领域中的对抗关系所决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个对抗关系就是阶级斗争。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阶级斗争”不是简单的两个集团之间的抽象对立。他的讲述很有意思。“阶级斗争”必须从抽象层面来看，进行一个具体分析。我想将之归纳为抽象的具体处境分析。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并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力量对比意义上的生硬对抗，而是包含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两者并不在一个平面上相遇。阿尔都塞认为，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眼中的阶级斗争体现为利用对无产阶级个体和集体的生存处境的再配置，让无产阶级通过无法分析和把握资产阶级的战略，从而放弃阶级斗争，自动成为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体现为对资产阶级战略的分析和理解，正如阿尔都塞所述：

工人阶级应当最大程度地考虑在自身之外、在资产阶级方面发生的事情。它不能只满足于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从而满足于自己认识自己；它也应当去看到和理解在另一方面发生的事情。重要的不是单纯的好奇心。重要的是同时把握对抗的两个项，以便能够将对抗作为构成这两个项的东西来把握，将阶级斗争作为把各阶级划分为各阶级、从而构成各阶级的东西来把握。^③

^① [法] 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陈越、王宁泊、张靖松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10 页。

从“工程学社会主义”到“斗争型社会主义”：读阿尔都塞《怎么办？》

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在他看来，具体的工人，或者工人集团，都不能是“工人阶级”。对阶级斗争的抽象的具体分析揭示了这一点。按照阿尔都塞的分析，这些被处于被剥削地位的阶级，必须先了解对立阶级的一切，才能理解作为一个阶级的“自己”，从而形成对社会总体的分析：将之一分为二，并在这种分析中进行阶级斗争。但是，现实中真的有这样“全知全能”的工人阶级？阿尔都塞认为不可能。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塑造出来的东西。资产阶级所期望塑造的并非一个与自身对抗的阶级，而是一个能被它控制、剥削和压迫，并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或中介。但是，事与愿违，这个工具反过来导致了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目标（部分的）挫败。这种失败让资产阶级必须面对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即便如此，这场斗争仍然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一标签。阿尔都塞发现了这一点，但之前的理论家并未强调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些人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没有区别，无非就是控制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中的管理权或统治权，这就和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方式一模一样；另一些人强调，无产阶级只要觉醒了自身的阶级意识，就能产生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武器。阿尔都塞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两个问题：其一，无产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不仅受到所处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且受到资产阶级对这些物质条件的配置的限制；其二，由于资产阶级主导了这一阶级斗争的战略，无产阶级在这个阶级斗争中的反方式，受到了资产阶级斗争策略的限制。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成就的。阿尔都塞最为鲜明的例子就是对“建筑”和“汽车”这两个看似属于“物质”的环境条件的分析。就“建筑”而言，阿尔都塞发现了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阶级斗争中的战略变化。在19世纪，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处于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强调围绕工厂建立集中的工人居所：

过去，工厂主在其工厂周围建造工人住房。这不仅对于矿业（矿工宿舍）而且对于冶金业和纺织业（工人新村）来说，都是常见的做法。这种解决办法自有其好处：工人没有通勤（=损失时间）的需要，他们能够在早上精神饱满地来到劳动岗位。工厂主在当地有他自己的商店、他的教堂、本堂神父和学校。他可以在劳动方面和出售食品衣物方面，对他的员工进行双倍剥削。他尤其可以就近监视他的员工，并通过劳动方面的剥削，通过消费方面的依赖和收益，也通过他的本堂神父和学校老师，任意支配他们。^①

这就意味着，工人住房这种物质环境体现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在以生产为主导的时期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策略。这种策略通过“建筑”这种物质条件塑造了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社会关系条件。但是，这一社会关系也会激起工人的反抗。阿尔都塞并没有说明，这种反抗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策略，而是一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可能产生的物质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物质条件并不会直接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而只是激发了后者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没有一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解，就很难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所设定和配置的物质条件中自觉发明一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第14页。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能通过操纵这种物质条件，重构自己的阶级斗争策略。“汽车”作为一种移动交通工具，凭借与建筑的配合，构成了以消费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阿尔都塞指出，“汽车+产权别墅”的配置并非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不简单是资产阶级为了消弭工人反抗、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的结果，而是一种对生产关系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的重新配置。阿尔都塞指出：

当然，这种在工人居住方面的“转向”，把住房选择权完全交给工人……城市地租起了主导作用——这有助于把大批工人赶到郊区，而郊区耕地逐渐被侵占。金融资本、城市地租和政治就这样共同导致了新的资本主义城市规划中居住区阶级特性的更新。被驱赶到远郊的工人尽可能住了下来，而当人们觉察到，被集中在生产中的工人还是太危险，便试图“改变他们的精神”，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通过让他们对所有物感兴趣，通过让他们购买在郊区的小房子和小花园，诱使他们远离阶级斗争。这就是独立房屋政策，它被毫不掩饰地明确构想出来，被公开宣称为工人阶级去政治化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做了业主的工人，所有时光都被用于打理房子和花园，远离所有“咖啡馆”，再加上长期贷款和小家庭的束缚——你还能为资本主义梦见什么更好的保证！^①

随着当代空间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结合，阿尔都塞的表述看起来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他的敏锐体现在，“空间的生产”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领域的改变，而是帝国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在具体环境中的变化。阿尔都塞认为，在这种变化面前，当时主流的社会主义发展构想已经遭遇了挑战。无论这一构想是以斯大林主义或是后斯大林主义的面目出现，我们都可以将之概括为“工程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被看作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社会工程。只要这个社会工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势”，从而赢得了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工程学社会主义”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体系不仅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而且以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为目标。这就意味着，“生产力”“生活水平”“优越性”绝对不是中立的，而总是包含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即资产阶级所塑造的阶级斗争策略。这种阶级斗争不仅用来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而且有意或无意地设置了阶级斗争的议程、目标、方式和限度。一言以蔽之，以“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名义，资产阶级是设计好了阶级斗争的战场，让并不能完整洞察战场环境和自身处境的无产阶级陷入了“客场作战”的境遇。

如何改变这种处境呢？阿尔都塞强调一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的发明。他认为，这种发明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对自身具体处境的理解。阿尔都塞指出了这种自我理解的难度，即“多和少”的问题。组成无产阶级的工人群体对自身具体的处境处于一种熟知的状态，因此，他们多少能知道自己具体的物质需要和反抗资本家具体剥削手段的策略。这让他们知道“很多”关于阶级斗争的细节。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占据了阶级斗争中的有利位置，工人们

^① [法] 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第 16 页。

的这些“知识”或者“观念”往往是有局限的：首先，这些“观念”并不反映资产阶级塑造工人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全部过程，尤其是这些条件背后的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其次，这些“观念”甚至是由资产阶级塑造出来、让工人“自愿”接受剥削和压迫的策略，它们要么遮蔽了资产阶级统治过程中暴力和直白的一面，要么就是一种控制和压迫工具。这让他们对阶级斗争的本质知之甚少。因此，阿尔都塞指出，需要人去理解、综合乃至重构工人集团对自身处境和反抗行动的表述。这类依靠工人群众，塑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人，阿尔都塞称之为“战士”(militant)。战士具有两种特质：首先，他要通过调查研究，从工人中知之甚多的部分中，发现和提炼他们未能了解，或者，按照阿尔都塞的话说，他们可以表达却不能理解的东西，从而形成当下阶级斗争的全面知识和正确策略；其次，他需要将这一策略诉诸实践。

三、反对“绝对历史主义”：葛兰西主义的不完善

在这一基础上，阿尔都塞开始了他第二部分的工作：批判一种不正确的阶级斗争知识及其策略。我们要注意，阿尔都塞把批判的对象设定为葛兰西主义，但是，这一批判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即以苏联和战后东欧为代表的“工程学社会主义”遇到了危机和挑战时，葛兰西主义成为西欧左派的一个替代方案。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一方案是有问题的，它虽然批判了“工程学社会主义”，却放弃了物质第一性原则，尤其是斗争策略的物质性原则。阿尔都塞认为，葛兰西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用“历史”代替阶级斗争的物质条件，这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通过掩盖历史发展的物质条件，“历史”遮蔽了物质在阶级斗争中的“永恒性”，阿尔都塞指出：

一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尽管这种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结构在剥削与阶级斗争的转变着的形式下保持相对稳定，保持同样的结构；而剥削与阶级斗争的转变着的形式之所以不断地变化，正是为了让生产方式的稳定性永远存在下去。^①

将“历史性”替代“物质性”忽略了如下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的结构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的物质条件所规定的，它不会轻易解体，只会随着自身配置关系的变化造成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而这种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被葛兰西主义者误认为政治斗争的“历史性”，从而彻底放弃了对阶级斗争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的结构分析。这种“历史化”的过程反而放弃了真正的历史：作为物质的生产发展史和被物质条件所配置的阶级斗争史。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即政治时间成了一种“观念斗争”或者“思想斗争”。这一点，我认为是阿尔都塞对葛兰西主义实践维度一个切中要害的批判。

葛兰西主义认为，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强势环节或者所谓“发达国家”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斗争，关键在于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但是，由于历史主义的影响，这种争夺变成了一种“观念竞争”。阿尔都塞认为：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第46页。

既然对历史主义而言一切都是历史的，那么它便倾向于把事物之间现实存在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公认的一切差异都予以简化，以便最终重新面对那个唯一的“历史”。我们非常明确地在葛兰西那里看到这一点：他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哲学，把哲学简化为政治，再把政治简化为历史。^①

这种简化造成了政治斗争中的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体现为，将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所有要素，不加批判地看作斗争的前提和目标，这就形成了一种民众中心的主观主义。例如，民众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物质、权利和情感需要，不加批判地变成政治斗争的目标和动力。在阿尔都塞看来，由于不分析民众需求背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这种主观的阶级斗争往往被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所捕获，不自觉地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某种助力。例如，当代西方激进左翼运动对多元化需求的迎合和身份政治的斗争，就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民众权利诉求的总结。但是，这种斗争也塑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身份产业”的兴起，甚至会成为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前段时间为各大游戏公司提供“性别正确”审查服务而遭到投诉的游戏咨询公司，美国教育系统族裔细分法挑起的各种底层民众的矛盾，就是这样的例子。第二个层面体现为一种“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主义，这一主观主义也与葛兰西主义对“历史”的理解相关。当葛兰西主义知识分子将“历史”简单化为政治之后，就不再关心主宰政治的物质基础，即“下层建筑”，而只关心政治运行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成为一种抽象的观念。这使得葛兰西和其追随者愿意通过改变观念，即改变“意识形态”，而不是真正地改变生产意识形态的物质条件，来进行政治斗争。

阿尔都塞并不否认葛兰西主义的重要性和部分正确。但是，他指出，当只寄希望改变观念，而不诉诸具体分析生产概念的物质基础，这仍然是抽象的政治斗争，并且是一种被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策略所限定和捕获的政治斗争，甚至会成为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辅助。在他看来，葛兰西寄希望“有机知识分子”影响“市民社会”的策略反而会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捕获。其原因在于，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彻底地中立化，而将“有机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抬得太高。例如，葛兰西认为，在教会中，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教士能够突破权力和规范，用整合起来的一套观念教化群众，反对封建制或绝对主义政治体系。阿尔都塞却指出，这种反对并不能推翻这一体制，而是成为体制自我修复和稳定的辅助。葛兰西认为，近代意大利知识分子立场游移不定，成为阻碍国家统一的力量；而法国知识分子依附教权，成功帮助本国统治阶级建立“有机的伦理国家”，并以此证明了“有机知识分子”在塑造共同体意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中的重要价值。阿尔都塞却认为，这种有机知识分子的塑造力量，恰恰只能在与之相配合，并生产出这些知识分子倡议的“观念”体系和整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才有效。因此，阿尔都塞指出：

在葛兰西的体系里有一个巨大的空白：一切与生产关系、与剥削有关的东西，以及一

^① [法] 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第 49 页。

从“工程学社会主义”到“斗争型社会主义”：读阿尔都塞《怎么办？》

切构成它们的物质条件的东西——资本、帝国主义（葛兰西对此只字未提）、劳动力、劳动力的再生产，等等。当葛兰西在广义上——因而在古典意义上（一切非国家的领域），因而也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提及“市民社会”时，他满足于说出这个词，因为他出于推理上的必要性，顺便也需要它；但他从未进入这个巨大的空白地带的现实、细节、机制和（“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作用。^①

这也就是说，葛兰西主义的立场虽然一方面试图突破苏联和东欧“工程学社会主义”的藩篱，开启了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变革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后者却又在另一方面沦为资本主义体系自我更新的一部分，将具有反抗革命潜能的市民社会，转化为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塑造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怎么摆脱贫兰西主义？阿尔都塞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不仅批判和对抗既定意识形态，而且强调批判生产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关系。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生产关系就是“权力”。通过引用福柯的“权力具有生产性”这一论断，他指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这个策略是通过他对马基雅维利的解释体现出来的。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种无产阶级的权力生产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体现为：君主引导群众，而群众在实践中冲击既定的权力结构。阿尔都塞指出，在马基雅维利那里，这种冲击呈现为“欲望”，即对物的占有的争夺。表面上，这一争夺是一种剥削的“初级形式”。^②但是，按照阿尔都塞的解释，这种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初级形式，却可以呈现为政治斗争实践的一种有效形式。这是因为，只有在马基雅维利那里，通过对国家权力的争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方式被有效阻断，而无产阶级也就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发现并生产出属于自己的权力，进而了解对手的虚实，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阶级斗争策略。

这种阶级斗争策略既包含实践性，又是一种独特的认识策略。它既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实践专注于生产力竞争，而放弃把握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问题；又不同于葛兰西主义，将这一问题观念化；而是强调在实践中把握阶级斗争的对手，通过争夺权力去生产权力，改造自己的斗争策略。显然，这种策略的实现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出现一个类似于马基雅维利那样的君主-人民关系，即社会主义政党领导层和群众的关系，前者制定策略，后者在前者的指导下贯彻斗争策略；第二个就是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分析不是一种简单的分析研究，而是在阶级斗争中随着对手政治策略的变化进行分析。阿尔都塞的结论显然呼应了马基雅维利强调新君主在斗争中的兽性（狮子）-人性（理解群众）-策略性（狐狸、伪装）三位一体的描述，更是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后者强调在斗争中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包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被阿尔都塞转化为一种适应了当时西欧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形势的社会主义理论。但值得思考之处在于，这样一种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启迪的学说，再“回到”当下中国的具体语境中，对我们有什么启迪呢？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怎么办？》，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123页。

四、尾声：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阿尔都塞有意识地避免了“生产力”这一塑造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重要物质条件。这固然是与反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重视社会工程、以“生产力”视角把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偏颇有关。但是，正如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缺乏对剥削的“物质条件的理解”的批判，“生产力”视角也是阿尔都塞理论的一个空白。如果“生产力”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生存安全、生活幸福和生命自尊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所依赖的物质条件也就是一种抽象的物质条件。中国的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后正是在“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辩证的统一关系，进而成就了一种特有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而阿尔都塞恰恰借用和改造了这一过程中最激进却最富教育意义的一段实践，脱离了具体语境，将其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现实的具体分析上。因此，阿尔都塞的工作极富启发意义，却在全球视野上没有严格遵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立场。

其次，在随后的实践中，阿尔都塞主义实际上并未形成对葛兰西主义的有效批判，反而让西方激进左翼实践在1960—1970年代的实践中，激发了单纯“斗争”而并非有效分析的斗争型社会主义实践。这也让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激进左翼知识分子抽象支持基层暴力抗议，混淆了恐怖活动、无政府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界限，更没有阻止欧洲社会民主左翼逐步被资本主义治理体制所吸纳瓦解的趋势。

因此，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我们也需要对阿尔都塞的理论进行具体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始终包含三个层面的难题。首先，我们必须发展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相适应，并符合人民群众需求和期待的生产力。这导致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想尽办法，甚至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先进管理技术，在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利用和提升，为解放我们的生产力而努力。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极少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只关心“优质生产力”。例如，引入AI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没有考虑人工智能是不是包含违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剥夺群众工作机会、辅助资本主义剥削效率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优化和解决这一问题，将之转化为塑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其政治关系的生产工具。其次，我们要警惕这种可能：逐步放弃各个层面阶级斗争的分析和把握，以及逐步丧失国家通过阶级分析促进和协调政治体系和生产体系中的各种矛盾，这会导致我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各种退让和对真正的阶级压迫关系的分析和体认不足。最后，我们丧失了对全球范围内阶级斗争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要么退让为现代西方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理念下的国家斗争博弈，要么全盘接受全球化体系中为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这显然是不再有斗争型社会主义斗争策略的表现。因此，我认为，阿尔都塞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不在于简单恢复其适应于欧洲发达社会中“全方位政治斗争”的策略，而是应该有机地将之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世界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全盘考虑，不能彻底废弃经历辩证扬弃之后的工程学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法，尤其是必须依靠阶级分析法对社会治理症候和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全新理解，实现工程学社会主义和斗争型社会主义的辩证结合。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